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学习材料选编)

沈阳市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编印

1971.12

目 录

一、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人民日报》短评	(1)
二、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	任文欣	(4)
三、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指导文艺创作	方岩梁	(10)
四、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	田文平	(18)
五、文艺创作表现矛盾冲突的光辉样板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评论组	(22)
六、业余文艺创作要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		
	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31)
七、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壮丽颂歌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35)
八、批判“写真实论”	宇文平	(46)
九、肃清“先验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		
——斥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的“创作需要才能”的反动谬论	武齐立	(55)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人民日报》短评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认真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以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为根本任务，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相结合，是这个创作运动的特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措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深入发展的今天，为了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继续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努力创作出又多又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要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积极反映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努力塑造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农兵英雄人物。要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肃清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克服各种错误的创作思想和不良的创作倾向。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要正确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努力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要实现这一要求，就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同时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要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创作；又要在群众性创作的普及基础上加以提高，产生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作品。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贯彻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应该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创造革命文艺所用。为了创造，需要借鉴；借鉴不能代替创造，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凡是内容革命、形式健康的作品，都要鼓励。业余创作，专业创作，都要提倡。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都要发展。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有运用这种创作方法，才能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把政治性与真实性统一起来，正确地反映伟大的时代，成功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在创作中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回避矛盾冲突，离开英雄人物的创造而单纯描写生产过程和技术细节，都是违反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要求的。这种创作方法，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才能很好地掌握。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并且要选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要有一支革命化的文艺创作队伍。要加强这支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努力培养和教育工农兵业余作者，并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整顿文艺工作队伍。选拔创作人员以及文艺工作的其他人员，必须注意政治质量。工农兵业余文艺队伍要坚持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活动，不要脱离生产劳动。在专业或业余文艺工作中，都要永远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社会主义的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文艺领域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这条战线上的斗、批、改任务还很艰巨，这个战场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各级党组织要在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过程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自觉性，抓紧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加强对革命文艺创作的领导。

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敢于革命，勇于实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进一步实现毛主席早就提出的号召：“**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最大胜利，迎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1971年12月16日)

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

任 文 欣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二十九年前发表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地科学地总结了思想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制定了一条最完整、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党的“九大”以来，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进一步批判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斗争中，又迈出了新的步伐。革命样板戏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大普及，文艺战线的革命大批判在向纵深发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在蓬勃兴起。

当前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具有许多特点。特点之一，就是：它是以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的。广大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都在努力地创作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

能不能把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写现实生活中工农兵英雄人物的“真人真事”？要不要受这些“真人真事”的局限？——这是当前文艺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文艺和生活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有关教导，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地塑造工农

兵的英雄形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深刻地阐明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

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主席又指出：“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命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就是文艺和生活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就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把现实生活中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斗争生活，加以集中概括，加以典型化，塑造出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成果——革命样板戏，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正在从事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真是何止成千上万。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都应当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些文学艺术原料，在这个基础上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生活的原料，只有经过艺术加工，才能造成文艺作品。革命文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再现，而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革命文艺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和事

件，虽然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原料为依据的，但是，它们决不局限于现实生活中原有的“真人真事”，而是作了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的，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典型。某些特定的文艺形式，如报告文学、特写等，是及时反映当前生活中工农兵的先进事迹的。不过，这种反映，也不是完全照搬“真人真事”，而是有所取舍，有所提炼的。

英雄典型的塑造，总是综合了现实生活中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创造，加以典型化而写成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英雄人物的“真人真事”。即便以某一个英雄人物的事迹作为创作的主要依据，也还要吸取一些其他英雄人物的材料，也还要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创造。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含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如果受某一个英雄人物“真人真事”的局限，对于生活的原料，不加“改造”，不作“生发”，要塑造出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那是很难成功的。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经验，正确地指出：“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为了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必须反对受“真人真事”局限的倾向。

局限于写“真人真事”，不但不能很好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而且还会给创作带来很多的问题，还会混淆文艺创作和实际生活的区别。由于这样的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别人就会要求作品中人物的每个情节和细节都要绝对的“真”，

都要完全的“象”。结果，作品就势必主题不集中，结构不严密，情节不连贯，人物不突出，不能成为很好的艺术作品。倘如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真人真事”，而其他人物是“假人假事”，或者在一个“真人”身上，既有“真事”，又有“假事”，这样，读者和观众往往就会以为作品中的这个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某某，那个人物又是某某，产生不好的副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曾经利用写“真人真事”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有的坏人或政治品质不好的人也曾经在这个问题上钻空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不就是曾经打着写所谓“真人真事”的幌子，篡改历史，歪曲现实，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来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有人搞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吗！不是也有人把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硬挂到自己的身上，招摇撞骗，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吗！我们必须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丧失政治警惕性。

在写“真人真事”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的糊涂观念，必须加以澄清。

“写本地区、本单位的真人真事，可以教育人，可以推动工作。”这是一种说法。这些同志不懂得文艺创作和新闻报道的区别。文艺创作所担负的任务，不是要报道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真人真事”，不是只为了表扬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工作，而是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

来，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工矿、农村、部队基层单位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中，编写一些表扬本单位好人好事的短小的演唱节目，可以在群众中起一定的鼓动作用，当然还是必要的。但是，作为文艺创作来说，既不要局限于这种形式，也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认为只有写本地区、本单位的“真人真事”，才能教育人，才能推动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经过艺术概括的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虽然写的不是本地区、本单位的“真人真事”，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更带普遍性，能够在群众中起更大的教育作用。革命样板戏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产生的巨大鼓舞作用和教育作用，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写真人真事，稳当，保险。”这是另一种说法。在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也可能犯一些错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只要方向对头，犯一些错误，并不可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要不怕犯错误，要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稳当”、“保险”云云，是“文艺工作危险论”的一种表现，同我们革命文艺战士是格格不入的。创作中所以会发生错误，就作者来说，根本问题是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问题。世界观不正确，艺术观不对头，即使写“真人真事”，也是不“稳当”，也是难“保险”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都应当树立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创作的思想，要敢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创作经验，逐步掌握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规律，努力提高自己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水平。

“写真人真事，容易，省力。”这是又一种说法。革命的文艺创作，是一项严肃、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写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作品，要塑造出高大

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就得下功夫，就得付出艰苦的劳动。在“真人真事”上依样画葫芦，“容易”固然是容易了，“省力”固然是省力了，但是，怎么能写出好的作品呢！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确实是比较困难和比较费力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和创作实践中，刻苦读书，认真改造世界观，在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吸取创作源泉，反复实践，总结提高，那么，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为了更好地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我们要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吸取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在文艺创作中正确处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克服受“真人真事”局限的倾向，为创造更多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而奋斗！

（原载1971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指导文艺创作

方 岩 梁

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发展，随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随着革命样板戏的普及，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

现在，我们上海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和工农兵业余作者，都在就进一步修改近几年来试验创作的作品或着手创作新作品中碰到的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在如何更好地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要求下提出来的，包括如何不受真人真事局限的问题，如何反映矛盾和斗争的问题，可不可以写“中间人物”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讨论，并且力求解决。但是，讨论这些问题，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前提，这就是：从实践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文学艺术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武器，是通过典型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这个特殊的规律要求我们在讨论文艺创作问题的时候更加重视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实践，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丰富的生活实践，革命文艺的创作实

践，是解决我们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创作思想上的各种问题的一把总钥匙。

例如，关于文艺创作如何不受真人真事局限的问题，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个实践问题。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艺术的虚构和概括是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即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为前提的。要文艺创作上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先要在生活积累上不受一人一事的局限。说文艺创作可以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并不等于说，文艺创作可以离开生活“自由想象”，爱把英雄人物塑造到多高就可以有多高。实践证明，这样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高于生活。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只有在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把握住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才能塑造出“**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革命英雄形象。

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建立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既要反对忽视认识的能动作用的机械唯物论，又要反对脱离实践的主观唯心论。就文艺创作而言，既要反对拘泥于“生活真实”的自然主义，也要反对那种脱离现实、随心所欲的所谓“浪漫主义”。在这方面，革命样板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李玉和是一个概括了中国革命史上

大量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典型。他是高度典型化和理想化的，但是他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瑰伟壮丽的精神世界，光彩照人的音容笑貌，包括每个细节又都符合历史的、生活的、本质的真实。我们有些同志，由于生活底子薄，脑子里光有几条抽象的定义，因而不能象革命样板戏那样，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在跟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中来突出英雄人物，往往只好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去代替丰富的现实生活，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代替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尽管总想把主题和人物往“高”处“拎”，甚至外加游离于斗争和情节之外的大段大段的豪言壮语，主人公自己说了不够，还动员周围的人来不停地说他怎么好怎么好。结果呢，由于这些东西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英雄人物还是高不上去。有的群众批评说，这叫“高空作业”。这个批评虽然很尖锐，但却充满着鼓励和希望，那就是说：赶快回到工农兵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基础上来吧！

文艺创作如何写矛盾和斗争？这同样是一个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这个基本观点，大家几乎是一致的。但一接触创作实践，分歧立即出现。有些同志凭空为自己设置了不少清规戒律，其中之一叫作英雄人物周围不应当有阶级敌人。理由据说是既然是英雄，就至少要把自己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有阶级敌人，也只能是刚从外单位调来的。干脆一点的就索性避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单纯写人和自然的矛盾，或者渲染突然事件和惊险离奇的情节，或者用所谓“误会法”来人为地制造一点戏剧冲突。这种“无冲突论”的倾向，其实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在文艺创作上的反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丢掉了这一条纲，是很难塑造出崇高的无产阶级英

雄人物来的。这不仅早已为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生活所证明，也早已为创作实践中大量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所证明。因此，说服这种思想也许并不难，但是，真正要克服这种思想却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这里同样有一个作者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问题。

如何写矛盾和斗争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我们说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的，但并不是说生活中所有存在着的矛盾，都已经象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矛盾那样集中、概括，那样具有典型意义。毛主席曾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刻而生动地阐述过这两者的区别和典型化的过程：在剥削阶级社会里，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而革命的文艺把这种日常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就能使广大人民“惊醒起来，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有的同志以为，要使典型具有普遍意义，就得磨去它的特殊性，不然，就叫做不够典型。实际上，“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认识这种特殊性，正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的遭遇，《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个人的经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同时又具有当时时代的任何别的一家、任何别的个人的经历所不能有的极其深刻、鲜明的特点，他们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因而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有的作者，不是从无限丰富的实际生活出发，而是从自己所设想的几个条条框框出发，找一些自己认为可以表现人物的事例来往里头填；

有的则机械地模仿革命样板戏，用模仿来代替自己的创造，以至造成人物和情节雷同的现象。学习革命样板戏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学根本，学精神，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出发，在实践中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一种是学表面、学皮毛，生搬硬套。后一种态度从根本上离开了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是我们应当力求避免的。脱离斗争实践，关起门来搞创作，这是文艺黑线的流毒，是文艺创作产生“左”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和右的（“人性论”、“写真实论”等）倾向的根源之一，必须予以坚决的批判。

至于能不能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只要我们真正从革命的生活实践出发，也是不难解决的。毛主席明确指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在我们实际生活中，英雄人物和中间人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没有中间状态的人物，也就无所谓英雄人物。因此，不存在中间状态的人物能不能写的问题，而是如何写、为什么而写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英雄人物虽然是少数，但由于他们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代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应当成为文艺作品最主要的描写对象。写一点中间状态的人物，目的正是为了突出英雄人物，写他们在英雄人物的带动和影响下不断地向先进方面的转化。革命样板戏《海港》中的韩小强的形象塑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中间人物”，他们是不断地在向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转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他们向先进方面转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请注意：是描写中间状

态人物的“改造过程”，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鼓励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而不是欣赏和美化他们，或者嘲笑和挖苦他们，更不是把他们跟英雄人物并列起来，甚至取代英雄人物。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竭力主张把《海港》改成一个写“中间人物”的戏，妄图用“中间人物”压倒英雄人物，这就不是一个能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即文艺究竟为谁服务、由那个阶级占领艺术舞台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必须划清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与“中间人物论”的界限，必须继续批判“中间人物论”。这种谬论从历史唯心论出发，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主张以落后人物作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渲染他们的落后心理和行为，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并以此来取消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同我们为了突出英雄人物而去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这里想谈一下怕不怕的问题。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背后往往有一个“怕”字在那里作怪。怕犯错误，这是“文化工作危险论”的一种表现，是必须通过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来加以肃清的。怕“危险”，求“保险”，希望领导上来划几条杠杠表个态，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我们党一贯提倡领导、专业创作人员和群众“三结合”，但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检验文学艺术的好坏也只能是这一个尺度。对于犯错误，要具体分析。政治上的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只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是可以避免的；至于艺术实践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常常是难免的。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只能在反复实践中逐步达到，不可能一次完成。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